

钟道：一个国内 89 六四“高自联”组织者的信仰见证（上）

—— 陈天石访谈

陈天石简历

陈天石 1991 年前曾用名陈章宝。广西玉林容县人，出生于 1966 年广西容县的农民家庭。从小其父亲就教导他：“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人，路过我们家的门口，绝对不能任其空手而过。”因此，陈章宝家乡所在村子里的人，要是有什么困难，都会到他家寻求帮助。许多外村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到他们村子，找到他家。因此，陈家在当地很蒙恩，陈章宝从小学起，就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

1985 年参加高考，陈章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89 年的时候陈章宝是北师大大四的学生。因为积极组织和参与“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或“高自联”的工作，并任北师大“高自联”的宣传部长，是北师大“北高联”大喇叭的实际管理者。

1989 年六四之后，陈章宝被收审于秦城监狱。

1995 年春，已经更名为陈天石的陈章宝，因参与王丹组织的活动，又受迫害，失踪于臭名昭著的武汉“青山劳改农场”。

同年秋，因抗议迫害，于澳门水域跳海，随后，又在广西被关押 3 个月。至此，陈天石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是三进三出。

后来几年，陈天石弟兄人生的愁苦，随着年岁的增长，不断的增加。

2000 年前后，陈天石弟兄蒙上帝呼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2004 年北京中原教会成立后，于 2004 年复活节在北京中原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并宣告和见证上帝的恩典。受洗后不久，与广西同乡郭姊妹结婚。一直坚持参与教会的服事，当时为北京中原教会的主要同工之一，遵从主耶稣的教导，从不停止聚会。

此后，有 7 年多的时间，在北京肖家河带领和主持着教会的一个聚会点。同时，在北京朝阳和顺义之间的一所国际学校，从事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以一个北漂者的世俗身份，在平安喜乐和艰难软弱中，养育着一儿一女，见证上帝的大能、恩典和荣耀。

采访缘起

我们的访谈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关于“信仰的见证”，下半部分则是关于“历史的见证”。

2012 年 5 月 19 日上午周六聚会敬拜后，于下午时分，笔者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的湖畔柳荫石头上，对陈天石弟兄做了将近 4 个小时的访谈，通过口述录音，对其过往有了一个很好的回顾，也对未来满怀了盼望。对于未来的盼望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因为“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 8:24,25）

以下是陈天石弟兄的访谈见证。从中也许你能够看见，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是如何拯救带领人信靠耶稣基督的。

一、民主思想的启蒙

钟道：1989 年游行时，你带头喊出“反独裁，反专制”的口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游行队伍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当时大多数人还是处于“反官倒，反腐败”的层面，没有上升到体制性的问题，而独裁和专制是体制性问题。请您谈谈您思想发展的脉络。

陈 天石：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核心教育主要有两个，一是爱国主义的教育，二是马列主义毛主义的教育。爱国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看到执政掌权者在爱国的名义下实际上在奴役着广大民众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十分的痛苦。马列主义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其解决社会冲突的阶级斗争方法，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实践中，演变成极端的暴力主义，这使我们清楚文革浩劫的一代对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另外，由于我从小喜欢历史和文学，考文科到了北师大中文系以后，在文艺理论、美学等等课程中，都要思考到很核心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人本身的问题。80 年代上学的时候，人本主义和人本思想的启蒙，在高校中的氛围是相当不错的，比较开放自由。虽然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阅读到的新书籍还比较少，但是从很多保守的教科书中，在有关人的主题论述里面，也会引发思考，也会从另外的方面得到一些启发。人作为自然人也好，作为公民也好，在社会上面，应当拥有怎样的自由生活？

对于我们个人权利的事情上，虽然从法理的层面来说，当时思想还很模糊。但是当时思想启蒙的气氛，加上老师们和学校外面的学者们，经常在学校里举行各种各样不同的讲座和沙龙，学生都非常欢迎，也很热衷于听这些讲座。事实上当时听这些讲座，都比我们从书本上所获得的信息要多得多。所以，我从 1985 年进入学校后，开始对许多还懵懵懂懂的事情开始了思考。

记得那年的 12 月 26 日，毛泽东诞辰多少周年的时候，我们还跑到北师大图书馆前毛的石头偶像前，去敬献花圈纪念。很多刚从文革过来的教工，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些刚入校的学生向老毛献花圈，他们都觉得很疑惑。

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自己到了 1986 年以后，思想迅速的改变，跟刚才所说的校园气氛有关。很快的通过回顾历史，结合看的一些现实，认识到我们整个社会虽然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各个阶层之间，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在生活 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我的感受还是非常的深。

虽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像我们学习都很优秀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整个社会里面，由于体制基本上还是处在一党执政和专政的状态底下，我本人对于社会的未来就有了很多的思考。由于当时看到那些当官的，也就是掌握资源的，手中有权力的，在利用特权，当时叫官倒也好，什么也好，在使得官民之间在竞争方面处于非常不公平的一种状态。再加上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实验，引起的通货膨胀非常的激烈。就像我们刚开始进学校的 1985 年，一个青椒炒肉 4 毛钱，到了 1986 年，快一块钱了，到 1989 年的时候，已经两块钱了。这都不是我们普通的学生，普通的市民所能承受的。

所以的话，通过进大学将近 4 年的学习和思考，在 1989 年的时候，我对社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虽然还不能从理论方面，或者是很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体系，这个系统，存在有多少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方面全面的研究。但是，感觉到制度的问题很大，尤其是专制的问题，一党独裁的问题，社会没有民主的问题，没有自由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在人文方面有一些思考的学生来说，感受是很深刻的。

所以，在同学们发起游行的时候，我只是将我的心里话喊出来而已。没想到同学们的反响是这么强烈，我也就更坚定了在后来所有我主管的宣传工作里面，就比较重视这个方面的方向，在广播稿件和组织稿件方面，都在向自由民主方面偏重。事实上，在运动当中，外界

也在不断给我们送一些资料来，包括西单民主墙的，还有国内外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一些中国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的问题，这些资料都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和我们北师大的宣传部这个地方来，事实上我们后来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信息中心，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信息集散点。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新的启蒙。基本思想脉络就是这样的。

二、89 民运的人和事

钟道：对于 89 期间的一些人，像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像在国内的马少方、李海等等，那些在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请您谈谈与他们之间的一些交往。

陈天石：1989 年在北高联这个平台上，从 4 月 24 号正式成立以后，到 5 月 7 号，北高联的总部搬迁到北大之前的这段期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北师大有一个包括各校学生参加的自治会的全会和会议。

很多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六四学生，所谓骨干或者领袖，我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认识他们，但是大部分人，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在工作关系上最为密切的还是我们北师大的几位。吾尔开希，他既是北高联成立以后的第二任主席，也在我们北师大，是我们北师大自治会的主席。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主管宣传，在我们北师大自治会里也是宣传部的部长，我跟他的关系当然就比较密切。

另外就是秘书长张军，副秘书长是后来加盟进来的梁肇敦，大家叫他梁二，这些人都很熟悉，算是有很多的接触。另外就是后来进来当北高联副秘书长的王超华，她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是 4 月底起北高联很活跃的一个骨干成员。我们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开会，算是接触比较多。其他的像周永军、王治新、封从德，郑旭光等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北高联的会议上，大家有一些见面，但是个人私下的交流比较少。我在以前的时候，也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我自己虽然会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想法，但是当我面对公众要做一个说明的时候，这方面就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很少在一些公众场合里主张我自己的东西，而一般都是通过组织工作，通过组织的运作，或者是写一些简短的东西，来尽我的一份职责。因此大家对我的印象一般也很模糊。

说一下马少方。少方是比较早的跟“北高联”联系的，吾尔开希宣布成立“北高联”以后，少芳就来了。他也是去参加“北高联”正式成立的圆明园会议的代表之一，但是他们学校北京电影学院比较小，他就老往我们学校跑。我开始的时候知道他，但与他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他第一次比较有名的演讲，是在我们北师大 318 纪念碑那里演讲的，是由我们宣传部和秘书处进行组织和安排的，所以算是第一次有了亲密的接触，他那个时候可能对躲在我后面的我印象也还不深。后来，我们在一起参与绝食的发起，慢慢的还有一些其他场合的见面，算是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那个时候同学和同学之间，这些骨干分子个人私人之间很深的交往，事实上是比较少的。

王丹也是我们一起发起绝食的时候，才有了直接的合作，之前虽然在不同场合见过面，但是也没有过交谈，后来大家坐牢出来在北京，我们见过很多次。

至于柴玲，由于她主要的活动不在北高联，而绝食以后我就主要在学校里面，因此我们就从来没有碰过面。李海那时候和我一样，都不算很活跃的人，属于在低下做事情的骨干，我坐牢出来以后才见到他，这些年来见得就很多了，很高兴的是，他现在也开始接受福音了。

三、青山劳改农场和跳海抗议

钟道：我们把时间跨度拉大，我们要谈到 1995 年春天您在武汉的“青山农场”被劳教，以及你和张智勇在 1985 年秋天因在澳门海域“跳海抗议”被关押。对于这两次的关押经历，请你简述一遍。

陈 天石：1995 年 3 月的时候，由王丹牵头，这些因为 89 六四而失学的国内落难学生，到北京香山的樱桃沟春游。我去了之后，就被北京市公安局扣押了，他们把我身份证没收，送到武汉一个劳改农场关押，后来知道那是国内很臭名昭著的青山农场。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事实上我是被失踪了，外界也没有人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存在了。

后来我是通过当时从青山农场释放出去的人，我托他们出去后，给我家里打电话。这样我的家人才知道我被关押，就到武汉市公安局跟他们要人，他们才不得已把我放出来。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关押我半年的，当外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因为没有理由继续关押我了，我就出来了。

我被关押劳动了 1 个月，4 月江南春寒料峭的天气下，下到扎骨头的水里去挑绿肥，因此在青山农场里面，我就风湿病发作，再加上本来就有腰椎间盘的撕裂，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走不动了。自己心情也很不好，就回到广西休息一段时间。

我 在北京的生意当时是做得很好的，做酒楼的装修，跟合作伙伴已经挣了好几十万块钱了。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发现我的合作伙伴已经把钱挪作其它的用处了，账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这个时候，也因为我消失了 1 个月，当时的女朋友，她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就提出来跟我分手了。我十分的难过，我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是这样的艰难，与朋友合作做生意，诚信上也很有问题，在政治上对我们也是动不动就拘押起来，甚至让我们失踪，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太适宜再继续在国内生活下去了，就有了出国的打算。

在经过了春天的这些事情之后，95 年夏天，我就申请护照。想试探性的通过中旅先到国外去旅行，能够自由的进出国门后，再到外面去找个学校去读读书，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去旅行的计划没能实现，申请到的护照也没有给我，也不让我出国去。广西的公安厅要求我交 10 万元的保证金之类的，我当时有点钱，但是没有这么多，我也觉得不应该交这笔保证金，我据理力争希望他们能够把护照给我，他们要求我等 3 个月。我也等了 3 个月，但是最终他们也没有把护照给我。

在非常苦闷的心情下，正好当时张智勇也有出去读书的想法。他是申请了护照，也拿到了出国的签证，但是后来公安局又通知他，要收回他的出境卡。公安局的人也正在到处找他，他也知道自己按照正常的途径，即使到了海关也出不去了。他当时看到我也没有得到护照，就从天津到了广西我的家里。当时我想，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用别的方法试一试。以前，在香港澳门这些地方，有许多人就偷渡过去了，自己就游过去了等等的，当时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别的一些方法，办些海员证之类的，其实也是可以过去的，只不过要花点钱，这些钱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 5000 块钱也是不小的数目。

我们两个人，89 年以后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心里面也很压抑。当时就想既然不给我们出去的机会，那我们就选择一个表达一下我们心情的方式，通过澳门环岛游，我们从船上跳了后，就游到对岸去，搞出一点新闻事件出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我们实际上没有把这个事情筹划好，还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很多的事情考虑的不周全。当我们联系我们的朋友来关注我们时候，联系不上，我们又急不可耐。最后我们买了 95 年 10 月 25 号的船票，就从珠海澳门环岛游的船上跳下去了，是在澳门的水域里跳下去的。结果我们还没有游到岸，就被澳门的保安警察部队，水上警所给我们捞起来了，把我们关在收容所里面。

我们去的时候也带了一些我们身份的证明，但是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澳门方面的政治部，来对

我们审查之后，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把我们遣送回来，交给大陆的公安。他们知道我们回来就会被区别对待，要坐牢或者劳教，但是他们不顾我们的抗议，第三天就将我们送给了珠海警方。

因为这个事情，张智勇被天津市公安局处以 1 年半的劳教，对我呢，据当时公安局的人说，上面是要给我 3 年劳教。但是，我们当地的政府方面，当地公安主办审查的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在我被关押期间，不断的有亲友，社会的人士，我们当地的一些开明的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和各种机会跟他们表示、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所以最终他们说，你在里面被关着，我们每天都被人骂，最终他们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处以重金罚款，以取代劳动教养，这样在里面前前后后被关押了 3 个月最终让我出来了。罚了 5000 元，在 95 年的时候是挺大的一个数了。

四、从民主运动到基督信仰

钟道：1995 年春你被送到武汉“青山劳改农场”关押，再到了 10 月份，因为“跳海抗议”，又被关押 3 个月。这两次的被关押都可以说是 89 六四的一种延续。想请你谈一谈，后来你是怎么接触到基督教？接触到了教会？进入到教会中？怎样认识上帝的？

陈天石：首先来说，事实上，我从秦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即便是在取保候审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努力工作了。从 1991 年去深圳工厂里面打工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力求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努力的工作，成家，过上一般人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正像刚才所谈到的那样，这中间总是受到一些搅扰，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出狱以后的头三年里，我申请身份证就不给我办。后来通过辛苦工作，好不容易能够有一点点经济能力以后，又发生了 1995 年一系列的事情，很不顺利。

到了 1995 年底跳海的事件后，我就检讨了一下自身的问题，认识到：人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忍耐。既然出国走不掉，就要来面对国内这样的环境。

所以，从 1996 年开春以后，虽然我是有一点容易冲动的毛病，但是通过调整心态，准备以一种新的心态全力以赴地开展自己全新的生活。我决心以后就不再提出国的事情了，在国内这个环境里面继续的努力，也想看看国内这个社会最终会走向哪里去？所以，从 1996 年开春以后，我就又回到北京重新建立了装修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其他一些服务性的生意，也赚了一点小钱，不多。直到 1999 年生活还算过得去。

到了 2000 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商场上，有许多别人能做的事情，我自己总是做不了。社会迅速的转型到，很多的生意，都是靠台底交易，靠行贿受贿，才能够拿到利润比较好的生意，装修工程尤其如此。而辛辛苦苦的本分去做，就很难挣到钱。当然在做生意过程中，自己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服务的精神，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说仆人的精神，也还是有很多的欠缺，所以，生意并不顺利。从原来挣了一些钱，到后来赔了一些钱，生意就陷入低谷，生活也陷入低谷，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大，在成家的问题上也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 2000 年前后，我整个人生就处于低谷。当时，我回顾自己的人生，从少年时代开始，无论是生活多么艰难，自己是很阳光的少年，后来是充满理想抱负的青年，最终在 1989 年经受了种种打击以后，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坚强的青年。但是步入社会以后，就发现，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自己遇到和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挫折，慢慢的就陷入了低谷而不能自拔，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愁苦缠绕着自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耶稣。在没有接受福音之前，我就感觉到我是生命有了问题。我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枯萎了。

但是，那个时候对生命的认识，还没有从《圣经》这个角度有所理解。正好这些时候，我们一些朋友都信主耶稣了。像张前进，在 1998 年那个时候就已经信主耶稣了，他就给我一些

像《生命季刊》这样的刊物。而在梅娜姊妹那里，我看到了一些福音方面的影视光盘，比如唐崇荣牧师的《神权、政权、人权》。虽然当时我对唐牧师的讲道不能完全接纳，但是在对于神的敬畏和顺服这一点上，我是赞同的。以后，我就发现基督教《圣经》所谈的这些道理，是非常的好。特别是从主耶稣的救赎牺牲，他的完全献上，对照到我们这些罪人要为自由民主事业的牺牲，从我们的有限，也让我完成了对主耶稣的人子到神子的认识，这对于破除无神论思想对自己的辖制也非常的关键。

在 2000-2002 之间，我虽然还没有去教会，但是在读到《圣经》话语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流下自己的眼泪。

五、接受生命中的永生之道

钟道：请您详细叙述一下您归信耶稣基督的历程。我们晓得人的愁苦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有的，人生得以脱离愁苦的唯一出路，就是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信靠基督，成为基督教会中的一员。

陈天石：我记得在我的一生里面有三次流泪是刻骨铭心记忆深刻的。

第一次流泪，就是 1989 年的时候，屠城血案发生的时候，在满城痛哭的时候，我是痛哭流泪，甚至心里头流血的那种感觉。

第二次流泪，就是我的父亲因为我被关押秦城，家人没有接到我被收审的通知，以为我已经罹难，他经受过一年的严重打击后，他后来很早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父亲，这个时候是我第二次的痛哭流泪。

第三次痛哭流泪，是我读《圣经》，看到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的时候。祂接着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完全被这句话所击倒，祂这句话可以说是征服了我，因此而泪流满面。

在信主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由于我之前人生的历程，我本身的愁苦，在刚才也说过，我自己的经验也告诉我，实际感受是自己在生命上出了问题。在没有读到《圣经》中的这些语言的时候，我的实际感受是，我生命已经枯萎掉了。我自己靠我本身的力量，没有办法振作起来，没有能力恢复过来，不能重新让自己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当我在这个时候读到《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言训的时候，我才认识到，耶稣能够给我带来生命。2002 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到教会去了。

从此我就没有离开过教会。而且我经常的将我自己对主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也请弟兄姊妹们为我自己的生活工作，包括我自己的婚姻祷告。神也很看顾我，信主以后很快神也赐给我一个姊妹，让我终于在 38 岁的时候，还是结婚了。我的姊妹也跟着我一起信主，我们现在也有了两个孩子。可以说从信主以后，我和家庭都在神的祝福和保守里面，我们虽然也没有很多的收入，我也不做生意了，到一个学校里做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应该说在生活、工作、家庭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平安喜乐。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主既然让我们重生，给我们生命，那我们最好的感谢神的方式，就是要牢记祂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传讲耶稣救赎的福音，宣讲祂的道。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从 2004 年起，参与到教会的服事。虽然自己能做的很少，但是就一直到现在，都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服事工作。

六、传扬福音为主而活

钟道：非常的感谢主，尤其是在我跟我的家人谈起福音的时候，我太太也常常说起，感谢

陈天石把福音传给我们。我是 2003 年非典过后，8 月底从深圳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的 10 月份，你邀请我们去教会，我们一家去教会以后 就很快被主的福音所征服。我们都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自己也决志信主了，因此是非常感谢陈天石弟兄把这生命之道介绍给我，使我们一家人都蒙神的保守。我们知道人都是很败坏的，尤其是看到自身的这种败坏和有罪的时候，确实是不得不降服在神大能的救赎当中，降服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想请你谈谈，信主服事这么多年，即经历过教会实际的生活，也看到教会里面，主要是指中国家庭教会，这种分分合合，这样那样的纷争。当然，因着人的有限性，我们尽管信了主以后，生命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也有很多的罪在里面。你对中国家庭教会在 2000 年之后，特别是中国家庭教会在城市的发展，以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谈谈你的看法，关于教会的问题。

陈天石：首先还是要补充一点自己生命的问题。刚才说认识到自己的愁苦，生命的枯萎，事实上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软弱，我信主以后最大的感受不是别的，就是一直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软弱。在初信的时候，热情比较高涨一点，进入到稳定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做一点服事的时候，往往自己很多以往的毛病会成为拦阻，看到自己很多的毛病还是改不掉，所以在服事的方面非常的亏欠。

至于谈到 2000 年以后教会的情况，事实上除了我们本身教会的发展，自己有些认识以外，看到北京这些有来往和交往的教会发展以外，外地的一些教会，因为我没有实际去感受过，只能是在自己所接触的范围里面谈。我自己是从信主耶稣的 2002 年以后，我看一直到现在 2012 年，至少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到 2008 年为止，到奥运会为止。我觉得家庭教会在城市的兴起是非常迅速的，虽然说在国内这个环境里面，也有一些政府对我们宗教信仰的，对基督教会也有一些限制和打压，但是总体上来说，相比现在而言，还是要宽松一些的。所以，我自己所在的北京中原基督教会，现在已经分为两支，一支叫做北京中原教会，一支叫做北京圣山教会。从 2004 年北京中原教会正式成立，到 2008 年奥运会期间，他的发展算是比较稳定的，从 1 个聚会点，到 2 个聚会点，3 个聚会点，现在是 4 个聚会点，包括现在持守北京中原教会这一支的话，现在是 5 个聚会点。发展是比较稳定的，神在做工，也很祝福我们的教会。

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在过去的人生历程中有很多愁苦的，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经历过 89 磨难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坐牢时间非常长的一些朋友，像胡石根和王国齐等，他们都信了主耶稣。奥运会没有开的时候，有一些人预言，奥运会会给中国福音的兴旺，教会的兴起，带来一个契机。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担忧，可能在奥运会以前，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整个奥运的环境，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会不会落实？所以奥运前中国社会是一种宽松的环境。但是我担心到了 2008 年以后，中国会收紧，各方面都会收紧。同时也由于中国的整个社会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实际的问题，如 2008 年暴露出来的三聚氰胺的“毒奶事件”，512 汶川大地震所暴露出来的房地产建设中存在的“豆腐渣工程”等等，社会的不稳定与政府的维稳之间的矛盾，会影响到中国家庭教会继续兴起的环境。

事实上很不幸的就是，我的担心通过 2009 年山西“临汾的教案”，还有“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被打压，以及 2009 年 11 月 1 日北京守望教会被迫在海淀公园门口大雪中的户外敬拜，上海万邦教会的被打压，等等很多的一系列的教会的案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几年中国宗教自由这方面的环境是处于自由度更少一些，政府在收紧，中国家庭教会内外的争战都很激烈。

所以，我只能从自己所看到的和自己所接触到的信息来说，我觉得目前是从 2002 年这 10 年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是处于低谷的时候。但是我本身对于未来是有信心的，中国社会目

前到了一个时期，到了社会向更加自由、公平、正义，最终会走向民主宪政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不只是 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信徒是这样认为，就是我所接触到的普通的民众、普通的公民，他们对中国社会走向宪政民主的向往也是非常的强烈。我相信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其他的公民自由权利的促进，是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在网络信息的时代，网络的推动力也是很大的，当然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结合在一起了，对中国社会走向更加的开放和民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推动力量。我也希望中国政府在民主方面，能够因应历史的发展进程，顺应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天命，在宗教信仰方面，也给予中国家庭教会在信仰自由方面更多的尊重和自由的空间。因为中国家庭教会是中国社会的底层稳定，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家庭教会所倡导的忍耐和仁爱，也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和谐所必不可少的教导。

七、小结

我们以倒叙的方式先记录了陈天石弟兄的信仰历程，下半部分内容就会涉及到陈天石弟兄在“89 六四”期间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这些经历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因为 我们知道，许多有份于“89 六四”那个划时代之历史事件的人都还在世，而“89 六四”在国内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89 六四”23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愿 下半部分的文字能够成为对“89 六四”的纪念。

初稿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改定稿于 2012 年 6 月 6 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une 06, 2012

钟道：一个国内 89 六四“高自联”组织者的历史见证（中）

—— 对陈天石弟兄的访谈

——（下）

文/钟道

钟道：我们是老朋友了，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信仰之路上的一些片段。现在我们都已经快年近半百，都有子女和家庭，因着基督信仰的缘故也愿意成为周围人和他人的祝福。下面就请您谈谈在 1989 年的时候的经历。我们知道 4 月 15 号，胡耀邦去世，你当时在北师大中文系读大四，在纪念胡耀邦的过程中，亲身参与和经历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陈天石：六四血案 23 周年快到了，追忆当年的往事，心里仍然在滴血的疼痛。人们习惯于忘记痛苦，但我无法忘记 89 年同学和市民的血泪。屠杀者欠着死难者的血，我们则欠着抗暴英灵们的遗愿。在此让我们首先向死难的同学和市民致哀！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英灵还没有安息，让我们用行动，早日告慰他们的亡灵！

1989 年的时候我本来应该是大四的学生，中间因为休学半年，有些课程没完成，就留到下一级，跟着 86 级的同学一起上课。

其实当时我和所有的学生都一样，只能说我们都是普通的学生。在胡耀邦去世以前，像我

们这些高年级的学生，经历过 1985 年 918 学生抗议日货的事情，也经历过 1986 年底当时从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发起的，蔓延到上海，然后北京的学潮。正是在 1986 年的那次学潮，导致了胡耀邦在 1987 年元旦后的辞职。

我记得 1986 年学潮，北京第一次的游行是 12 月 28 号的晚上，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没过几天，就听说胡耀邦因为反对清算这次学潮，在党内有人批评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方面，工作不力，因而让他下台了。

大家当时就对胡耀邦下台，认为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群众、党内、知识界的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的学生，对胡耀邦的看法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文革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做了很多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工作，社会的上上下下对他还是有非常良好评价的。

没有想到 1989 年 4 月 15 号他突然就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社会上有很多的传说，说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边，和哪一位当时的领导人，发生了言语的冲突，导致了 他心脏病发作，这样那样的传说。但是其实胡耀邦去世以后，北京的学生很迅速的自发的发起了悼念活动，主要还是基于对他整个一生良好的评价，觉得他就这样逝世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在北师大的湘籍学生发起 4.19 游行以前（这个游行是在 4 月 18 号发出公告的），北京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北师大也好，政法的也好，北大、清华和其他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去献花圈，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思和悼念。但是北师大的这次 4.19 游行，在北京高校中，算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计划、有规模的游行。

4.19 游行是早上 9 点钟左右从学校出发的，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游行。因为是悼念 的游行，所以早上从东门出发的时候，同学们心情都很沉重。我当时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表示，所以就领着同学们喊“悼念耀邦”、“耀邦千古”等等这类的口号；很快的，从口号方面又增加了另外一些内容，比如“铲除腐败”、“铲除官倒”；接着我又领着喊出了“打倒专制”、“打倒独裁”这样的一些政治内容的口号。我没有想到同学们对后面这些有关政治性的口号，反应的非常强烈，甚至比前面喊的“铲除腐败”、“铲除官倒”这类的口号，更为强烈。

我们这支队伍，刚出 北师大东校门的时候，其实人就已经很多了，出去的时候我感觉就有 1000 多号人左右。当队伍走过小西天，队伍的长龙已经至少接近 3000 人左右了，我回头 都看不到尾巴了。从开始我是在后面跟着，到后来我领着喊口号以后，就跑到队伍的前边去，成为了在前边领队的位置了，带着同学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去了。到天安门广场去以后，当时学校很多团委的、老师们也跟着去了，因为当时广场人很多，没什么秩序，人山人海的，大家到了广场就感觉群龙无首了，就感觉大家在那里 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大家就分散了，各自回去了。这是第一次 419 游行的一些情况。

钟道：请您接着谈谈您在“89 六四”期间的主要经历。

陈 天石：1991 年 1 月 22 日专案组对我宣布免于起诉、解除审查的时候，有一份《关于解除陈章宝收容审查的决定》，要求我按照他们预先写好的《陈章宝在 1989 年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的错误事实》填写决定书中的认罪事项。他们的这份审查结论，对我在 1989 年的事情有两个定性，开头说陈某某是高自联的骨干 成员，被通缉后予以收容审查，除了前边参加非法组织这一条以外，后面还列举了我的七大“错误事实”。当我看到第七项事实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对外宣布我取 保候审 7 个多月之后还要秘密的将我收监审判呢。因为这个审查的结论定性语气非常的严重，说陈某在主持宣传工作期间，组织印发了数万份传单，“反对四项基本 原则，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校内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好在他们的安排是让我认“大罪”就说是认罪态度较好，就免于起诉了，因此“犯罪事实”变为“错误事实”了。这几条按时间排列的“罪状”，正好就是我在 1989

年的经历中涉及的主要事件。

刚才说到，我第一次参加公开的纪念胡耀邦的活动，是湘籍同学发起的4月19号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游行活动。那天回到学校后，到了晚上，大概9-10点钟以后，我听说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回到学校来。他们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面请愿，所以我后来就骑着自行车前往新华门去观看当时的请愿。我到达的时候，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看到新华门前面，已经有一些武警，他们加了一些岗哨。我也看到一些同学情绪比较激动，聚集在新华门门口那里，要求递交请愿书。

以前我跟赵常青谈过一些细节，这里就谈简略点儿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现场看着手表，看着发生的事情。包括什么时候武警的广播喇叭，要求同学们撤离。以及之后，他们采取了一些对聚集的学生，切割、分离的措施，将里面的一些同学，与外面的同学驱散开等等的。我们在外围的被隔离到外面去以后，他们就采取了强行驱散，我跟其他同学一样被驱散离开后，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去。到了广场去，也看到这些武警，拿着大棒驱赶学生。我当时骑着自行车，也看到一些同学在哪儿勇敢的喊：“大家不要撤退！”其中有一个声音，后来大家说是吾尔开希，我当时跟吾尔开希还没有个人的接触。

在这次被驱赶的过程中，因为我骑着车跑的比较快一点，我没被打着。在我车后边跑的，有被打伤的，其中有个同学跑到天安门西南角的时候，头上被打了一个大包，当时我们摸了摸他头上的大包。因为看到后面武警赶了过来，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大家很快就撤退了。

后来，我又回到西单去。看到从里面被驱赶出来的一个同学，她的脚踝部已经骨折了，肿的很厉害，走不了路了，被同学从里面半拉半抬着，基本上是抬着出来的。我们和几个同学，就帮忙把她放上了出租车，跟她一起来的同学就把她拉医院去了。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是4月20日凌晨5点多钟了，他们开始采取武力驱散行动的时间是4点50分左右的事情。

回到学校后，略作休息，我就想着那天夜里发生的“420血案”——同学们请愿不成，反被驱赶，有人流血受伤。我心里很不平静，就在上午跑到学校的318纪念碑底下（北师大学生经常聚集处，也是学校的信息集散中心），跟大家呼吁了一番。很多听说和参与了“420血案”的同学们，我们就一起商议着要到人大、北大、清华游行去，结果是同学们很快响应，我们就往那边出发了，人还挺多，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都有上千人以上了（也有说有两三千人的）。很快聚集起来的队伍，就浩浩荡荡的往人民大学出发了。

因为游行的过程中，下起了大雨。我们在路上被雨淋了以后，队伍就给淋散了，也到了人大了，而往北大、清华的计划就没有实现，零零散散的到下午就回到北师大了。回到北师大以后，我的同学就跟我说起“有一个新疆籍的同学（即吾尔开希）在学校318纪念碑底下，声泪俱下的演讲”，说“他的演讲非常好”。跟我非常好的一个同学叫郭常宝，他就说“你应该去找一找他”，也有同学说“或者是我们看到他了，也告诉你哪个是他”。当时同学们还不知道吾尔开希的名字，只是知道他是新疆籍的一个同学。

钟道：请您谈谈高自联是怎么成立的？

陈天石：其实我们都是叫“北高联”的。4.20那天以后，4.21早上，很早了，7点钟左右我去打水，在我们学校的水房那里，发现有一张吾尔开希写的“启事”。他这张记得是8开红纸写的“启事”写的很清楚，开希就宣布“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了”，他临时自任为主席，希望各系的同学跟他联系，还希望各个学校的代表跟他联系。他这个“启事”给我的震动比较大，但是，我回去以后，没有想是不是马上就要跟他联系。

我的同班同学张军很快就过来找我，说：“开希宣布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我们

应该和他联系。”我没想到张军会来找我，4.19 那天游行的时候，我在队伍里面后来变成带头喊口号的，可能是大家都比较 认可我。我跟张军虽然是同班同学，但因为我刚到 86 级不久，跟他也没有很多个人的私交，我还是住在 85 级的宿舍里头，他住在 86 级的宿舍里面。所以，当张 军找我的时候，我没有响应，隔了一会儿他又过来了，他说：“我们还是去吧！去看一看吧！”

在之前，我跟同宿舍同学说：“在这样突然的群众运动中， 临时成立的一个组织，可能是没有太大的作用。”我的同学郭常宝听后说：“但是有一个组织，哪怕是临时的，也比一盆散砂没有组织要好。”我表示认可，但想到 我可怜的父母，我默默的对自已说，请你们原谅不孝的儿子了。所以，后来张军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找吾尔开希去了。

事实上，我和张军是各系 来的比较早的加入“北高联”组织筹建的，当时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分工，有一个是需要主持秘书工作的，张军就毛遂自荐负责秘书工作，我们两个都是中文系的，大 家认为中文系的搞宣传比较好，我也在大家认可之下负责宣传工作。马上我们很快的就决定，要参加第二天 4 月 22 号胡耀邦的追悼会，以及怎么样组织参加追悼 会。

我们就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义，向各个高校发出通知，要求大家当天晚上到北京师范大学来集中，一起出发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第二天早上 举行的追悼会。联络的工作做了安排，筹款方面的经费，我们也开展了募捐，等等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之所以提出在晚上 10 点出发，是担心政 府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对我们阻挠，以及和我们做秋后的算账。我已经步行去过一次广场，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能到达广场，什么时间去合适，所 以我提这个时间，大家也都认同我的建议。我们当时也确实是不愿意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的。

这是 4.22 学生到广场参加追悼会发起的情况，后来在天安门广场 4.22 追悼会的事情，包括下跪请愿的细节，大家也都清楚了，这里就不详细说。

追 悼会以后，隔了一天，到 4 月 24 号，通过跟各个高校同学们的联络，我们发出了一个通知（以前的采访张军说过，通知是他的亲笔），就要求各个学校派出代表， 在那天晚上 7 点到圆明园南门去汇合，一起来商议和宣布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成立的事情，我们派出的代表就是吾尔开希。同时的话，其实我们北师大的学 生自治会，虽然在 4 月 21 号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的正式成立会议，也是 4 月 24 号晚上 7 点在物理楼 101 正式成立的，由张军和我主持。

参 与组织“北高联”和“北师大自治会”并担任宣传部长，后来既是我被认定为骨干成员的最主要原因，也成为我的第一大“犯罪事实”。组织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事 情被列入“错误事实”里面，但在解除收审决定书的悔过事项中好像我没有填写，就是我不认为这是“犯罪事实”，这个可能谁来审，也不能叫做犯罪吧？

另 外就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以后，就有了“人民日报的 4.26 社论”，发生了 4.27 学生抗议“4.26 社论”的大游行。“4.27 大游行”我作为 我们学校里面主要的指挥者之一，参与了那天的游行。这是我的第三大“犯罪事实”。其实 4.22 集会和 4.27 大游行的良好秩序以及和平方式，当时不但感动 了全北京，也可以说感动了全球，也为整个 89 的学生市民运动奠定了榜样，这些游行虽然不符合当时北京市颁发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但要按照十条规定来 申请，我们的宪法权利就被剥夺了啊！

在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一半是我自告奋勇后被大家推举来负责宣传部。“4.24 圆明园会议”之前的“北高联”，后来有人把他叫做“临时北高联”，那段时期的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4.20 真相”和“4.22 事件始末”和请愿的七条上面，后来政府批判的 几份稿子，都是我们宣传部的通稿。另外我们还接收了北师大体育系 86 级曾晓明同学用收录机改装建立的简易“广播台”，把它升级为功率强大的真正的广播台。这是 89 年北京高校里面学生自建的第一个广播台。后来曾晓明以所谓“抢夺枪支和军用物资”数罪并罚被判了五年（执行四

年)。北高联正式成立以后，施行常委制，从5常委到7常委，后来到了9常委，绝食开始以后，增加了财务部，还给各部刻了一枚印章，宣传部名义上就由北大和北师大轮流执掌。这中间的过程，有其它已经发表出来的资料，大家可以了解。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une 06, 2012

钟道：一个国内 89 六四“高自联”组织者的历史见证（下）

钟道：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绝食的事情，能不能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和个人的想法。

一直到4月底，政府搞了个“4.29对话”，当时由于我组织宣传部在广播台进行“直播”并立即播发反驳稿件，将这个对话叫做“封建包办对话”，结果这又成了我的一个“罪状”。但我们认为对话确实是很重要的，因此“北高联”就决定要有一个对话代表团，以便开展跟政府的对话。当时各个高校就按“北高联”的决定推举了“学生对话代表团”的代表。但是，由于从4.20开始到4.22追悼会以及后来的学生请愿，都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中间还有过一次非常和平有秩序的“5.4大游行”。这次游行在广场宣读了《新五四宣言》，本来这是一个双方可以找到“台阶”的机会，但是政府内部高层由于权斗，谁也没有出来对学生的“新五四精神”作任何的表示。（参加组织“五四大游行”，也是我的一大“罪状”）。这样，爱国爱民主的学生还是戴着“动乱”的帽子，这一方面不符合事实，激起了公愤，而政府一直没有给自己和学生一个“台阶”下来，所以，到了5月8-9号，各个学校就有了学生们绝食的酝酿。绝食是学生们通过大字报提出来的一些想法，9号我在北师大和北大都看到了绝食的呼吁，因此“北高联”内部就针对绝食的想法展开了一些讨论。我们觉得5月15号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如果能在5月15号前的两三天开始我们的绝食抗议的话，效果可能比较好。

绝食队伍是5月13号下午1点多，从北师大出发的。在北师大，绝食真正的组织工作，开始发起，实际上是从5月11号的晚上，吾尔开希和我、张军我们这些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要骨干，商议以后，觉得最好就在13号进行绝食，但是不能以“北高联”的名义发起，应该以学生个人的名义发起。这样商议以后，吾尔开希当晚出去跟别的高校的一些同学，包括少芳、王丹他们，有过一些见面，也包括王文、杨朝辉等一些人在内。他们见面后大家最终形成了一致的意见，5月12号，他们就来到北师大找到我。事实上绝食当时是以个人名义发起的，但是又必须要做到有效的动员，所以他们一方面应该是听了开希的建议就来找我们宣传部，这样也可以通过我们使用“北高联”的外联部进行动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北师大作为运动前期，5月7日以前的北高联总部，在组织工作包括宣传和外联工作上的能力和效率都是得到各校的信任的。所以就在5月12号早上8-9点钟开始，真正开始绝食的签名，少芳和王丹等人包括我在内11人签名之后（开希的名字是按他的委托由别人代签的），我把王文写的开头语作了修改，给起了一个名字叫“绝食先锋队名单”，并且附上一份三四百字的简短《绝食宣言》就交给“北高联”外联部长熊文革向北京主要的13所高校发出了通知。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是，这份由我安排授意的《绝食宣言》，开头语是“在伟大的四月爱国民主运动中……”，从绝食开始到结束，都竖立在绝食团的中间，复印件现在由香港中文大学在保存，它的真正执笔者是我的同学，当时已经转到经济系86级的周晓霖，

他后来被学校处分后于 1990 年毕业后去了云南，而 1993 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能找到他，他彻底的失踪了。

签名和发通知的工作在 5 月 12 号的上午就完成了。紧接着 12 号的下午，一直到 13 号的绝食出发之前，整个的绝食筹备工作，北师大这边是一个核心。在通知发出去以后，很多高校都积极的响应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去其他高校看，但是从第二天来的同学的构成来看，有北大、清华、北航等等高校的，都是非常有组织性来的。然后，一起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这是绝食的发起。我本人虽然是“绝食先锋队”名单里的签名者，但是后来吾尔开希他们一致认为，后面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我们的骨干成员，在后边来主持。因此我在去绝食的半路上，就被他们给抬回来了。所以我就没有去绝食。

这样我就成了那个“绝食先锋队”名单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去绝食的。后来在收审时政府的人就批评我：“忽悠别人去绝食，自己不去绝食。”参与发起绝食行动这条“罪状”，是他们按着搜集到的《绝食先锋队名单》而确定的。

其实按照今天的话来说，我算是比较顺服一点的。确实是大家都去了以后，后面的工作没有人做了，可能会比较混乱。我又是主管宣传的，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做后面的工作，其实声援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也符合我本人对于绝食的想法，就是我们知道不可避免的群体绝食是很激烈的政治抗议行动，虽然大家也抱了献出 血泪甚至生命的决心去绝食，但我们不能让同学们就一去不回了。绝食只是一个政治行动，它的目的是要达到和政府之间的真正对话。

这样一来，从绝食发起以后，我工作的重心基本上就是在后方，在校园里面。天安门广场这边我也经常去，第一天我组织了声援以后，第二天的 14 号，我也带领了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去声援。

5 月 14 号这天下午，我们学校的老师也第一次参加了游行。我们的老师刘晓波当时也站出来了，他带领老师的队伍，跟我们学生的队伍，是并排着往前进的。据我了解，刘晓波老师自从那次去了以后，就留在那里了。我们两个到广场还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到学生的对话代表跟统战部所主导的对话，没有获得成功。当看到王文等学生代表从统战部回到广场的时候，刘晓波老师他就说，赵紫阳他这盘棋已经输了，如果第二天市民和工人不起来的话，这次运动可能很快就会夭折了。他后来一直在广场，在北师大的队伍里面，他在前边带领同学们做一些宣传的工作，组织的工作等等的。我在后方，他们很多的稿子也拿回来，给我们的广播台播放。一直到戒严，到六四，这整个的过程，晓波和其他一些老师，都在广场。大家也比较清楚，就不再赘述了。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学生运动发展到了绝食以后，尤其是到了 15 号以后，北京市民、社会各界，包括党政机关，上至中央一级的单位，都已经出来游行，像 517 超过百万人的大游行声援广场。再结合后来的全民抗暴，因此完全可以说，1989 年的自由民主运动，实际上已经发展为广泛的全民民主运动。而从全国响应的范围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性。不过，我的陈述在此仅限于个人的主要经历，全民性的一些重要事件，也有各界人士的不少回顾。

钟道：请您重点谈谈戒严之后，特别是 6 月 3 号晚上，您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

陈天石：5 月 19 号北京市和中央机关的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戒严以后，“北高联”内部有主张撤回来的，有一些主张留在广场的，有过一些争论。其实在宣布戒严之前，实际上广场已经降温，人数少了，绝食已经是象征性的了，学生们也没有更多的“能耐”了，走向和平结束是完全可以的。后来经过了 2-3 天情况的发展，我记得是 5 月 22 号傍晚，“北高联”在北天开了一个会议，就宣布“北高联”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回来了。只留下“广场指挥部”在天安门

广场继续，事实上是正式确定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存在。

那个会议，以前跟常青弟兄也聊得很详细了。戒严后从5月20号的头两三天起，由于市民的阻拦，学生的阻拦，戒严部队的进军就很不顺利。在阻拦军车进城的活动也比较无序的情况下，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刚才说的“北高联”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以外，就是安排、协调各个高校，跟外地学生、市民之间，阻拦军车进城这件事情，当时做了一个分工。我当时就将市民送给我的一张军队的进军路线图，交给会议来安排，就是“北高联”的秘书处，秘书长我记得当时是由王有才在主持。

在戒严以后，一直到5月底这段时间，基本上处于每天都在喊“狼来了”，我们每天都在预备怎么样来“防狼”的这样相互之间的疲劳战里面。到了5月28号的时候，事实上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了，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次运动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很不好。所以，外界主要是香港来的亚洲学联和香港学联，香港工会的代表、教育界的代表、宗教界的代表等等，已经开始为学生们安排撤退和善后的一些工作了，就给各个学校发放一定金额的资金。之前，我们“北师大宣传部”作为“北高联宣传部”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据点，我们的费用主要都是从“北高联”支取的。

这样5月28号在北京饭店就由香港学联给各个学校发放善后资金，准备撤退，我们学校是2万5千港币。大的学校都差不多，小的学校就少一点。我和自治会的财务一起去的，很不幸的是因为我不懂得怎么使用港币，觉得港币不好用，所以就反过来又委托香港同学来帮我们换成人民币，结果导致了北师大就没有拿到这笔钱。至少是我在学校组织工作直到6月4日的早上都没有拿到这笔钱，后来不知道他们交给谁了？这就不太清楚了。

6月2号，在六部口学生市民和戒严部队有一些冲突。当时我正好在现场，看起来象野战部队的士兵象发了疯一样对着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学生也爬上了戒严部队运输物资的军车上面去，所谓的缴获了他们的一些军用物资之类的，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已经撤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事实上冲突更加升级了。

到了6月3号晚上，我在学校，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他们要进军，清场，宣布清场了。那天晚上，我在学校里面主持学校里面的工作，号召大家前往天安门广场去。我们当时以为人去的越多越安全，市民出来的越多越安全，市民们的想法和我们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那天晚上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市民，老人和小孩都在声援的人流中。事实上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对方他们完全是荷枪实弹的，我们从来不敢想象政府的军队，人民军队，他们会拿着作战用的坦克、武器面对我们的市民学生，他们真的会开枪。傍晚天还没黑的时候，吾尔开希和刘晓波老师也回到学校来了，当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张伯笠。晓波老师在校门口广播台作了要克服知识分子软骨病，要坚持和广场学生共命运的演讲，开希也慷慨陈词，呼吁大家前往广场声援。但我们知道，只要他们是清场，哪怕是不开枪，因为人数实在是太多了，都很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所以我们就商量，只要发生了一些混乱的情况，有一些人员伤亡的话，我们就会号召同学们往回撤了，就不会跟他们做那种强烈的抵抗，避免强烈的冲突发生。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他们会一开始就大开杀戒。

所以在当天晚上约9点半钟以后，当我接到前边同学飞驰回来，带回来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公主坟和军博这一线方面，已经有我们学校的两位同学被打死的消息的时候，我当时还不太敢相信。所以我就赶紧往西单那边去，去看一看情况，结果我们到了西四接近西单的时候，大概是晚上10点多了，往那边去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人们都在往后撤，并且告诉我们士兵就在前面不远在追着开枪。而且救护车，飞驰的救护车刺耳的呼叫已经在告诉我们伤亡的人数已经很多了。

我知道事态已经很严重了，就马上返回学校。从那天晚上11-12点钟开始，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组织同学们怎样撤退。呼吁同学们不要预备用燃烧弹、砖头之类的东西，不再试图做

任何的抵抗。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发现离开学校 1 个多小时，学校里面 已经有些混乱，很多同学已经准备了这些东西，燃烧瓶都是市民送来的，学生没有制造的能力。学校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市民，好几万市民在那里，我们的广播当然 也是在广播。这个时候学校没有往外边派出救援队，所以当时同学们情绪就很激动，要求学校向外边派出救护队，学校没有给予积极回应的时候，同学们变得激愤起 来，有的同学准备使用过激的手段，比如说拉响警报，甚至声称要烧了学校的主楼之类的，逼学校出面。我一看觉得这样不行，就派人去把那些激愤的同学叫回来， 叫纠察队保护主楼。后来我们还是让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到了学校门口现场，我们一起来商量怎么样去救援前边死难受伤的同学和市民。最后方福康校长也就答 应，派出学校医院的医护人员前往救援。当时的 22 路、47 路公交车都是通过北师大门口的，有些司机主动响应，早就开着车过来，连同学校的车，还有现场自告 奋勇参加救护工作的市民和学生就往前方去了。

从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血案，到血案真正发生了，我们就从要求声援的工作，很快的就转变成为后 撤、救援。到了 6 月 4 号 6-7 点钟的时候，这个工作我觉得当时的的时候，这个转变是比较好的。虽然我们不能挽回已经发生的血案，很严重的这么一种情况，但 是，我们要避免更惨重的情况出现，因为戒严部队就在马甸桥离我们学校北太平庄很近的地方，部队就压在那里，那里也有我们的同学和市民一起围着军队，军队交 了一些武器给他们，我们的同学从这些部队里面，扛了不少的枪支回来，我记得第一批就有 47 支残缺不全的长枪，还有两支短枪，还有军用物资，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都有一些。学校门口附近的现场当时是很危险的。军队随时可能兵临我们学校，进入学校。

在这个过程里，如何的避免学校师生，尤其是市民们，跟军 队在学校周围发生正面的冲突，这是当时的的时候，我们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在广播台的广播中，就从原来的很激愤，到冷静下来，处理紧急的事件。广播中就呼 吁大家撤离、远离校门，要避免伤亡和正面冲突。这是那天从凌晨一直到天亮，我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比较好的是，后来这些燃烧瓶都撤下来了，这些木棒砖头之类 的都处理掉了。

当时校长兼党委书记方福康和吴孟副校长，他们两个一起来到东门现场的。他们将我拉到一边说，像吾尔开希和梁二他们离开学校出去以 后，不一定再回到学校，也不知道他们以后的情况会怎样，但是对于在学校里面留下来的像我这样的一些“北高联”的主要骨干成员，他们认为一旦戒严部队包围学 校，甚至进入学校的话，就有可能抓一批来杀掉。校长就建议我藏起来，最好就往北京外边走，马上撤离北京；他还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学校可以尽力而 为。

钟道：请把您当时撤离的过程，以及进入秦城监狱，还有在秦城监狱里对你审查的结论，如何出狱的等等，做个简单的回顾。

陈 天石：“六四”当天天亮以后，看到一路痛哭的同学们陆续从广场撤回到学校后，我在数学系博士吴植桥师兄的护送下开始了逃亡。他刚刚骑车从天安门经过新华门 和六部口屠杀现场回来，他就带着我从二环骑车前往北京火车站。中午我在北京站坐上开往武汉的火车，后来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被听到北京血腥镇压后而忿怒的学 生和群众阻断，我又从武汉坐船到了江西的九江，接着坐火车到南昌，绕道鹰潭于 8 号到了广州。

6 月 9 号我到了广东的珠海。后来我看到通缉令，当时虽 然我不在 21 个里面，但我看完这份公开的通缉令之后知道他们一定还有另外的通缉令，事实上也是这样的。香港学联的同学也通过亚洲电视的时事追击节目播出了 我们预先约好的图片，让我按他们留给我的地址联系他们。但我在珠海没有躲藏好，到 7 月 1 号，在珠海的斗门被拘捕，12 号送到广州的黄华监狱，于 7 月 15 号 被押送到北京的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里面我们很多的同学和一些老师被关押在一起，被审查。在审查期间主要是把从胡耀邦逝世到六四期间，每一天自己在这所有的时间里面，做过什么事情，都要做所谓彻底的交待。

我当时就坚持的说，我和所有的学生一样，是出于爱国的情，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参加了这些学潮。我个人觉得当时什么事情也都是公开的，没什么可隐瞒的，因此基本上自己做过什么事情，都是如实的陈述。当然在那个时候，开始头半年的时候，形势还是非常紧张的。有一些事情，比如说绝食的发起，阻拦军车，还有涉及别人的事情上面，也是有所保留的。事实上政府很早就开始对我们这些骨干成员进行关注了。所以他们收集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些“绝食先锋队”的名单之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拿到手了。审查中也问我，为什么要逃亡？我也很清楚的说，担心这种秋后的算账。这是人之常情吗！我确实是希望自己能够逃到外面去。但是，在外面的有没有什么人协助，在外逃这件事情上，我就说，我当时看到已经逃不掉了，也相信中央说会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就买了一张船票，准备回老家了。事实上我最终的卷宗预审员给我看了，就是以那张船票结尾的。企图外逃和在逃亡中散布北京屠城血案的“谣言”，是我的又一条“罪状”。

到了1990年6月5号傍晚，专案组向我出示了于6月4号晚上7时35分签署的取保候审决定书。经过学校的担保，我从秦城监狱出来被直接送往火车站。在车上，负责护送的就对我说，因为中美之间的高层磋商和谈判，决定要放一些人，我正好是他们圈定（一周年当天）放出来的两个北京学生之一，另外一个周封锁。就这样，经过我父母的再次担保，被送回家，在当地公安局的监管底下，经过了半年多的取保候审期。等到了王丹等同学被判刑以后，专案组和学校派人到广西，在我们镇上的派出所，先宣布对我的勒令退学处理，让我签字同意之后，才宣布对我免于起诉、解除审查，结论如前所述。

钟道：你从一个穷苦的农家子弟，到当时名校的天之骄子，之后放弃了可能的大好前程，当时有些什么样的面对社会人生的思想准备？能不能谈谈1991年以后，你在广东的工厂里面辛苦打工的经历？我也知道你回北京以后也曾赚过一些小钱，但直到现在，政府总是忘不了你，你的腰椎又有老伤，处境总的来说很不容易，现在你有没有一些感想？

陈天石：当时有想过可能是坐牢的结局，进去后想过或者15年以后可以靠烤白薯过日子。现在，总是觉得欠着死难同学的太多。

那些艰辛的经历，与献出生命的相比，算什么呢？不谈最好，以免成为阻吓的样板。人们总是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事件重来，你会作何选择？还会不会支持绝食？我只能说，选择有时是和权利链接在一起的，但如果绝食，则宁可一人前往。然而自由结社，享有言论的自由，公民的集会、游行，甚至反对暴政的抗议，等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应当予以保障的。真正和谐的社会，是公平和正义得到彰显的社会。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因为当初我们的激进而责怪学生们，甚至有人将血案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生。但你不要忘记，被屠杀的是跪着要求自由的孩子，是在和平中呐喊结束专制的青春，是呼唤我们起来当家作主人的灵魂！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啊？如今在哪里呢！23年过去，我们的下一代，“六四二代”还面临着我们当初一样的问题，甚至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腐败更甚、集权更专、自由和民主被置于维稳的火炉之中，这才是我们这些“成人们”要扪心自问的。呼唤我们回家的市民，敢于抗暴的北京市民，他们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容忍暴行，为暴行开脱，容忍历史在谎言中被遗忘，是这个大国的耻辱。

很难说，在哪一天，孩子们还要踏着他们父辈的血泪起来呐喊。作为父亲我在想，走在前头的不应当再是他们，不要再让他们在灿烂中被射杀。年青人总有所谓“不成熟”的弱点，最

先起来呼喊的往往是青少年，但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应当是以“成年人”即“成熟的”公民为核心。当孩子们一味的往前冲的时候，及时的挺身而出，是我们为父母的义务。为自由、民主、宪政治理的社会奠基，我们有着比孩子们更大的责任。愿公平、正义引导我们，并赋予我们力量，涤荡污秽、清除罪恶，使祖国早日成为和平美好、充满爱的家园。

钟道：愿我们共勉！

初稿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改定稿于 2012 年 6 月 7 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une 06, 2012

UnRegistered